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Situation and Identit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 Copyright Imports

Min Yang^{1,a}, Fan Jia^{2,b,*}

¹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²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yangmin1979@163.com

^bjjafanfanjia@163.com

*jjafanfanjia@163.com

Key Words: Copyright imports; translators' situation; contributing factors; identities; rights and interests

Abstract. Taking the best-seller Chinese version of *Ferryman*, written by the English writer Claire Mcfall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not only puts forward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awkward situ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 copyright imports these days, but also analyzes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from three levels. Due to the mere fact that the translators' failure to own the copyright in real practice, the author poses a question about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identities and appeals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cerned to make laws and lay down regulations for translators in difficulties to go by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中国译者在版权引进中的处境及身份认同

杨敏^{1,a}, 贾蕃^{2,b,*}

¹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实验基地, 西安, 陕西, 中国

²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四川, 中国

^ayangmin1979@163.com

^bjjafanfanjia@163.com

*jjafanfanjia@163.com

关键词: 版权引进; 译者处境; 成因; 身份认同; 权益

摘要. 本研究以当前国内出版社版权引进大趋势为背景, 以畅销书英国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的小说中译本《摆渡人》为案例, 指出中国译者在版权引进中的尴尬处境, 并从译者自身、出版社及社会三个层面剖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译者实际上不拥有版权。作者同时提出了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 旨在呼吁我国权威部门尽快通过立法及行业规范为困境中的译者提供保障, 使译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在版权引进中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1. 版权引进的趋势

随着1992年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 我国便开始了与世界接轨的、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近30年来, 中国出版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部分出版社完成了体制改革, 在国际市场的浪潮中百舸争流。随着出版业的开放和日益成熟, 以及国内读者的需求驱动, 越来越多的国内出版社从国外引进翻译版权, 版权贸易发展如日方

升。

版权引进是指将外国所创作、生产或加工的版权商品，包括外国拥有的版权服务，购买后输入本国市场的版权贸易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的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引进的图书、录音制品、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及电视节目合计达17 252项，原版权所在国家或地区中，美国以5 461项独占鳌头，其次分别是英国2 966项，日本1 952项，法国1 100项；2017年引进版权总数高达18 120项，美国以6 645项依然拔得头筹，英国以2 991项位列第二，其次是日本2 232项，法国1 164项仍然位列第四。国外的版权商品被大量地引入国内市场，不仅使广大读者便捷地了解到了当前发达国家学术发展的动态前沿，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我国读者的国际视野，也推助了国内出版社的品牌建设，品牌效应又相应地带来良性循环。伴随版权引进带来的高额利润也使其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所有的版权引进商品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翻译环节。翻译环节兹事体大，可以说，翻译是版权引进中的重要媒介。译者是版权引进过程中中外信息、文化、思想交流的使者。但是，在现阶段，我国出版界、学界及社会并没有给予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足够的重视，对版权引进问题的研究也很少涉及中国译者处境及身份认同。

以2015年6月上市的英国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的小说中译本《摆渡人》为例，它的销售量至今已超过100万册，并成为了出版界一个“现象级”的营销案例。截至2017年1月，在当当网图书畅销榜排行中，《摆渡人》排在第7位，高于《平凡的世界》；在亚马逊的2016年图书销售排行榜中，《摆渡人》排在第20位；在京东图书2016年小说销量榜中，《摆渡人》排名第二；在新华书店，笔者也看到《摆渡人》被摆在畅销书架最醒目的位置上，推荐理由是“畅销欧美33个国家的心灵治愈小说”。《摆渡人》的国内出版商北京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马时光”）也因此盆满钵盈。分析中译本《摆渡人》大获成功的因素，出版界无一例外地侧重于它的市场营销做得极其成功，例如，不错的封面装帧与设计、畅销榜内的排名，甚至借势于作家张嘉佳和王家卫合作的影视作品《摆渡人》蹭热度、炒作，出版物与电影互相借势，形成联动，造就了炙手可热的作品。但笔者查阅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对于《摆渡人》中译本的译者付强在打造畅销书中发挥的作用及其真实身份却是只字未提。众所周知，一本图书是否能成功引进并成为畅销书，除了版权经理人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图书的翻译质量，合适的译者在版权贸易中的作用不可小觑。那么，在版权引进中，中国译者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呢？

2. 中国译者在版权引进中的尴尬处境

从古至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都离不开翻译工作，当前蓬勃发展的版权引进贸易也离不开翻译工作。翻译理应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翻译产业的概念及范围，还没有一个得到一致认可的比较清晰明确的标准。

还是以畅销书《摆渡人》为例，英国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与国内出版商白马时光所签订的版权引进合同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使每册书英国作者只获利一元，克莱尔·麦克福尔也已经通过获取的一次性稿酬和重印版税在中国财运亨通了。和《哈利·波特》的作者 J. K. 罗琳一样，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写出这样一本畅销书，并因此富贵逼人。白马时光也因此博得满堂彩。尝到甜头的白马时光已经签约了《摆渡人》的影视代理权，其影视作品可能在几年后上线。这对于出版商白马时光来说，既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又获得了好名声，打造了其出版社品牌在书业和读者中的口碑。原著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和出版社似乎在此案例中形成了双赢的局面，那么中国译者在类似版权引进过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呢？译者的处境足可用尴尬来形容。作者查阅国内外的文献资料，译者一直退居幕后，媒体对于《摆渡人》中译本的译者付强的真实身份也是三缄其口。译者相对于原著作者和出版社来说，似乎是“隐身”的，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既不得名，也不得利。

“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坊间但见动辄数十万言、鸿篇巨制的洋洋译著，却没有哪

一位翻译人因此而腰缠万贯，名成利就，译者为译著付出的心血与精力，绝对与所得的报酬不成比例。”翻译工作也因此就像坊间所自嘲的那样，在版权引进中“翻译就像作料中的盐，原著作者、出版社、读者以及社会都需要那么一点点，离开了它都不行，但又不那么金贵。”笔者将从译者层面、出版社层面及社会层面深刻剖析在版权引进博弈中，这三者各自扮演的角色。

（一）译者层面

从译者层面来讲，译者不拥有版权是造成译者在版权引进中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虽然《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在其行使著作权时，在不侵犯原作品著作权的前提下，依照此法享有著作权。理论上讲，译者对译作享有的权利与原作者对原作享有的权利相同，即既有财产方面的权利（国外亦称经济权利），也包括人身方面的权利（亦称精神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遗憾的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译者往往在收取一次性的翻译费用后便失去了对译本的控制权。目前，我国在处理译本版权方面的惯例是由出版方拥有版权，版权掌握在出版社手里，这样的情形使译者和出版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译者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众所周知，“对价原则”是法律合同的精髓与支柱，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等价交换（抱布贸丝、以物易物）”，也类似于教育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一物代一物）”的说法。“等价交换”表明双方必须达成某种交易；一方负起的义务必须和另一方享受的相应权益价值相等。在目前版权归属出版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译者往往只能得到一次性稿酬或者千字稿酬，版税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即使译者殚精竭虑翻译出了一部销量逾百万册的畅销书，实际上所获得的财产方面的权利也是极其有限的。

译者所得的财产方面的权利微乎其微，那么其精神权利是否有保障呢？在现实中，译者身份“隐身”，形同无物，译者对译文没有著作权，顶多有署名权。有的译者被剥夺了署名权，劳动价值被无端贬低甚至被剥削、占有，译者起诉出版社的案例屡见不鲜，高强度的投入与微薄的回报形成尴尬的悖论。（刘习良，2006）美国现代翻译家温伯格（Weinberger）抱怨说，自己的翻译作品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但译本的封皮上却没有自己的名字，因而不过是个无名英雄。译者一直以来没有太高的地位，其实译者的隐身正是出于其地位的低下。人们总是抱怨译者职业水准低、缺乏敬业精神、缺乏社会责任心。中国译者处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其尴尬的处境已不足为外人道了。

（二）出版社层面

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国内出版社纷纷把目光投向海外，希望通过版权引进在新的出版版图上分得一杯羹，版权引进一度成了国内出版社看重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入世后，翻译出版外版书需要支付高额的版税，外版书出版的成本骤然飙升。对于版税，普通民众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其实这个数额是相当大的。出版版税的计算方法是图书单价×图书印数或销量×版税率，版税率一般多在6%到10%之间。仍以中译版小说《摆渡人》为例，如它的定价是36元，销量若为10 000册，版税率按国际标准约为1~10 000册7%，10 001~20 000册8%，20 000册以上9%，那么出版社需要向版权方支付10 000*7%*36，即25 200元的版税。还有一项类似于霸王条款的约定叫“不可退还的预付款”，常规书大约3 000美金，约合人民币20 715元。也就是说，这本书在国内还未出版，国外版权方已经将一大笔钱纳入了囊中。而且，加上出版社有发行折扣，只好压缩各种成本，翻译成本首当其冲。按照市场上各类翻译公司人工翻译服务收费标准，达到出版级别的英译中60~80元/千字计算，《摆渡人》220千字的翻译费用也只有区区1万多元。这对于一本销量逾百万册的畅销小说给作者和出版社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而言，译者个体的薪酬经翻译公司层层盘剥后，和付出的心血相比较，薪酬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被忽略了。

出版社方面当然不会对译者抱有太多的同情心，他们会说出版业竞争激烈，自己也是迫

于压力，不得不降低成本。况且，译者的薪酬不是单个出版社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译者若嫌薪酬低，完全可以不干，这听起来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译者的薪酬低可以不归咎于出版社，但出版社的版权引进活动既是一项文化活动，更是一项商业活动，所以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版权引进的过程中，一些出版商为了蹭热度，抢热点市场，在和译者签订翻译出版合同时，在压缩其经济成本的同时，还缩短了译者的翻译周期。处于弱势群体的译者只能按照出版合同的要求，加快自己的翻译速度，在重压下工作，这最终必然会导致劣译、胡译泛滥，从而败坏译者的名声。译者的声誉受损，这无形中打击了译者的劳动积极性，进而不利于整个版权引进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来看，西方出版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发展史，已经确立了较为明确的版权许可关系，而我国虽然在现阶段版权引进如火如荼，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产业，有许多涉及译著版权归属和译者权益的法律法规还正待健全完善。直到目前，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就译著版权归属、译者薪酬、译者署名权、译本质量控制、译本质量仲裁、版税等问题为译者提供真正有效的行业指导，译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更亟待解决。

译者常通过翻译公司和出版方签订翻译合同，但对于翻译行业质量标准目前我国业内还没有达成共识。由于我国成立翻译公司的门槛较低，专职译员少，职业意识不强，甚至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导致译者薪酬低，以至于他们“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译文质量水平不高且不稳定，严重降低了我国版权引进的层次。因此，权威部门对现行翻译公司设立必要的技术门槛和规范译文质量标准也势在必行。

在我国权威部门提供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的同时，广大读者群体也要提高对译者的敏感度，正视译者的社会地位问题，使译者能够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中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

广大读者群体拿到译本后，通常只关注其译文质量，对于译者却鲜有关注，甚至熟视无睹；而译界也鲜有篇幅对版权引进中中国译者的身份认同进行探讨，面对这种不利的情势，我们有必要对译者的身份重新进行解析。

3.中国译者在版权引进中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认同”既可以指“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如“民族认同感”，也可以指“承认、认可”。身份认同是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在版权引进过程中，中国译者的身份认同就表现在译者个体积极地或消极地参与到翻译实践活动中，以实现其对自身的认可。

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它形成于社会、文化和语言现实之中，同时又为促进社会、文化和语言发展服务。“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创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鲁迅语）”

在国内版权引进过程中，中国译者由于不拥有版权，面临着薪酬低、工作压力大（文责自负、侵权纠纷）、工作周期短、工作成果饱受诟病等重重压力，他们很难实现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在现实中，多数译者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但在版权引进过程中，他们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是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这种沟通是否成功，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译者是关键。

传统上，人们把译者看作“翻译匠”，看作应该毕恭毕敬效忠原作者和原文的“奴仆”。译文不是你的，你不拥有版权，你不过就是个干活的，你要不干，有的是人抢着干。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只把自己当成被动、消极的“干活的奴仆”，严重缺乏主人公意识，不把自己当成主人，甚至对于自己的译者身份讳莫如深。译者除了被翻译理论家忽视的同时，其自身也有妄自菲薄的倾向。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译途上连年征战，前仆后继而乐此不疲呢？原来许多

译家高手与前辈，对于翻译都有着一份执着与热爱，他们跋涉译途，不为什么，只为了一种“人家不做我来做”的使命感，在默默耕耘、埋头苦干中，为传递文化贡献一己的力量。（金圣华，1997）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王克非就在其研究中指出，翻译研究更多地关注译出语、译入语，但是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特殊意义注意不够。田德蓓在其研究中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读者、作者、创造者和研究者等多重身份。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自费邀请了世界各地其作品主要语种的译者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起参加诺奖派对。莫言自己说：“我借这个机会，向很多翻译我作品的翻译家、汉学家致以敬意。通过翻译，我们的文学才能走向其他国家。”莫言在 12 月 8 日的一个小型演讲中说道：“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 43 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它却用了 6 年。”莫言作品的日语译者吉田富夫也在被邀之列，他对“什么是翻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这个创作不是随意的。所以我认为翻译的责任是很大的，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读者。结果只能留给后代。”这一系列的迹象无不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译者的身份嬗变经历了不同阶段，其发展趋势必然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实现其自身的身份认同指日可待。

4. 结语

《读书》杂志有一段老舍论翻译的“绝妙好辞”，他说，“翻译这工作是极要紧的，但是它使我太痛苦——顾了自己，便损害了别人；顾及别人，便失落了自己。言语的不同，没法使彼此尽欢而散……”寥寥数语，道出了翻译工作的痛苦与艰辛。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商品性是翻译服务的基本属性，也是翻译服务活动的基本特征。应该承认，大多数人从事翻译活动出于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但与物质需要、家庭生计也不无关系。古人云，“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在我国现阶段，专职译者固然存在，但更多的译者只是偶尔“客串”，他们的主业仍以高校教师、科技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作家、编辑居多。由于“翻译版权”多属于“发起或组织翻译的一方（出版社）”，译者对译本几乎不具有任何控制权，这使得他们在经济层面处于弱势群体；在精神层面，译者不是“隐形人”，就是“奴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译者失去主体性的优势，造成了自身的身份认同感消融危机。在看似康庄大道的版权引进贸易中，绝大多数译者是既不得名，也不得利，这就像果戈里说的那样，“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因此，一方面，译者不能顾影自怜，把自己当作出版社的矛盾对立面，而是出版社的利益共同体，在版权引进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从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也鼓励出版界、学界及社会多加重视译者的主体地位，在道义上给予译者归属权和尊严权。除此之外，我国版权部门应为译者提供可依仗的法律法规，使译者可以随时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自己的权益。

致谢

本论文受 2017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西语商务语篇话语策略的跨语言、跨文化研究”（项目编号为 2017K019）；2018 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计划项目：“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跨文化语用差异分析：以“一带一路”相关议题为例”（项目编号为 18XWD02）；2018 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教材语料库的商务英语词汇计量研究”（项目编号为 18JK0638）资助。

References

- [1] Zhu Xianchao, Han Ziman. *A Basic Textbook for Translators — How to Establish Translation Companies* [M].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6.
- [2] Xiao Weiqing. *Translators' Rights & Interests and the Publishing Contract for Translation* [J].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09 (02).
- [3] Wang Sinan. *The Frequent Problems and Their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Copyright Imports* [J]. *View on Publishing*, 2014 (05).
- [4] Jin Shenghua. *Talks on Translation at the Lakeside: 80 Informal Essays on Translation* [M].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7.
- [5] Tian Debei. *On Translators' Identities*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00 (06).
- [6] Liu Xiliang. *Enhance the Industry Management, Furth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06 (04): 6.
- [7] Xu Yuanchong. *The Art of Translation* [M]. Beijing: Intercontinent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06.
- [8] Wang Kefei. *On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J].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997 (04).
- [9] Liu Lini: *Ferryman Moves Forward in Dispute* [N]. *China Culture Daily*, 04th, February, 2017.
- [10] Fu Qiang (translator). *Ferryman* [M].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 [11] Claire Mcfall. *Ferryman* [M]. Edinburgh: Floris Books, 2017.